

一代巾帼

主编

王振英 杨湘岚

一代巾帼

王振英 杨湘岚 主编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出版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发行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75 印张 240 000 字数
1991 年 7 月第 1 版 199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册 定价：5.00 元
长春市第五印刷厂印刷

序

吉林省妇联编写了《一代巾帼》一书，从历史的角度提供了一部对广大妇女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自尊、自信、自立、自强”教育的教材，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一代巾帼》一书生动地记述了 29 位在祖国人民如火如荼的解放斗争的烽火年代投身革命，为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杰出女性的奋斗经历，展示了一代巾帼的英雄气概。她们在旧社会不向所遭遇的悲惨命运低头，不甘忍受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蹂躏残害，在中国共产党的启迪、发动之下，毅然奋起革命，对敌人进行英勇战斗；革命胜利，尤自强不息，为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祖国，继续新的征程，继续贡献她们的力量。她们有的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有的是留在我国东北对日寇艰苦奋战的抗联老战士；有的是当年在国民党残酷统治镇压下，冒死献身的地下工作者；有的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艰苦卓绝地战斗、工作的老党员。她们有些是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吉林，有的是生在吉林、长在吉林。她们与吉林的广大妇女一起，为振兴中华，振兴吉林，在吉林这片土地上耕耘、奋斗，做出了优异成绩。她们是一代中国女性的缩影，是我国妇女解放道路上勇敢有为的先行者，是吉林大地的光荣，是吉林妇女的骄傲。

今天，在我国进行四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进一步充分发挥广大妇女的作用，十分重要。《一代巾帼》一书的出版，将使我省一千一百万妇女，从难忘的历史和前辈感人的事迹中，受到教育，更加认清时代赋予广大妇女的神圣使命，更将焕发出蓬

勃向上的力量。

我们相信，吉林妇女一定能够继承和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以老一辈巾帼英雄们为榜样，不断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和自身素质，以崭新的精神风貌，勇作振兴吉林的先锋，为建设我们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大立新的功勋。



1990年12月15日

目 录

磊落坦荡的一生.....	(1)
战士的情怀	(15)
两袖清风的“孺子牛”	(27)
吉林妇女工作的开拓者	(42)
长白山的女儿	(49)
耿耿忠心一片情	(59)
活跃在三统河畔的巾帼英杰	(70)
一位执着追求的女性	(79)
延河岸边同志情	(91)
军旅女杰	(97)
我的人生之旅.....	(113)
长征精神激励她奋斗	
——访吉林省妇联第一任主任王东瑜	(131)
一个抗联女战士的足迹.....	(143)
一个敢于掌握自己命运的女性.....	(155)
去延安的旅途上.....	(168)
延水清清赤子心.....	(180)
征程迢迢 丹心似火.....	(187)
我的路.....	(195)
一颗燃烧着的心.....	(203)
在烽火中成长的女性.....	(212)
我参加永吉反奸清算斗争的回忆.....	(219)

坚定的信念 不懈的追求	(227)
奔赴思念的松花江畔	(241)
一片丹心为人民	
——于立仁同志的自述	(255)
刺刀下的幸存者	(263)
难忘的秋天	(270)
在松花江两岸的日日夜夜	(279)
留在长白山脚下的足迹	(289)
神奇的力量	(299)

刘亚雄简历



刘亚雄，1901年10月生。山西省兴县人。1924年参加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历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中央组织部干事、科长，中共河北省委秘书长，晋冀豫三专署专员。1949年7月，任中共长春市委书记。1952年7月调任全国妇联城工部部长，劳动部副部长，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兼驻交通部监察组组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被任命为交通部部级顾问，并当选为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1985年离休。1988年2月21日病逝于北京，终年87岁。

磊落坦荡的一生

魏丽晶 张 晶

1988年3月3日下午，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哀乐低迴，气氛庄严肃穆。刘亚雄同志静静地安卧在绿叶掩映的鲜花丛中。她的遗体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花圈、挽联摆满了整个大厅。李鹏、姚依林等中央首长来了，薄一波、康克清等老领导、老同事来了，刘亚雄家乡和她工作过地方的代表也来了。哀乐牵动着人们的思绪，无声的泪水在追思刘亚雄饱经风霜，为党为人民无私奉献，磊落坦荡的一生……。

封建礼教的叛逆者

刘亚雄出生在山西省兴县黑峪口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她的父亲刘少白是晋西北的一位充满爱国心和正义感的开明士绅。他不重封建规训，为人达观，对刘亚雄的成长有着重要影响。刘少白对长女刘亚雄特别珍爱。在刘亚雄6岁的时候，她的母亲和奶奶准备给她缠足，她不依，求救于父亲。刘少白认为妇女缠足是封建礼教规定的残忍行为，态度鲜明地支持刘亚雄。奶奶和母亲也深知缠足的痛楚，不忍心让亚雄受那份罪，就不再勉强。于是刘亚雄成为黑峪口一带及兴县第一个不缠足的女孩子。当时，有不少人评头品足，议论纷纷。但刘少白对此不屑一顾，他由着亚雄“吧嗒”着一双天足，和乡间贫苦的儿童在一起嘻戏玩耍，使刘亚雄从小就形成了坚毅豪放的性格。

刘亚雄7岁的时候，父亲送她到娘舅家的私塾读书。舅舅是个古板、守旧、迂腐气十足的老学究。他总是让学生端坐正堂，目不斜视，一心读书。小小年纪的刘亚雄忍受不了课堂上千日一律的沉闷环境，对陈旧的诗书文章毫无兴趣，不肯用功，以致使舅舅叹息她是“朽木难雕也！”但刘亚雄对父亲订阅的《新青年》杂志欣爱备至，对父亲给她买的《新女儿经》倒背如流。这些新鲜活泼，充满新思想、新观点的文章，使生活在闭塞农村的刘亚雄开阔了视野，在她的心灵深处产生了同情农民，渴望了解社会的愿望。

刘亚雄11岁那年，父亲把她送到太原读小学。不久，母亲也搬到省城居住。由于父亲收入微薄，困窘的家境使刘亚雄常常出入当铺，过早地领略了人情的冷落和世态的炎凉。刘亚雄曾一度辍学，后来父亲利用业余时间谋职，得到一笔稿酬，才使刘亚雄回到了学校。

1917年，刘亚雄考入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太原女师，这所学校名义上是一所顺应新思潮而诞生的新型中学，但仍保持着旧时代的封建特点。名目繁多的校规，限制了学生们的生活自由。对此，刘亚雄内心十分不满，她心底里追求自由的愿望和不畏封建礼教压服的性格，使她成为学校众所瞩目的人物。

有一次，刘亚雄的同班同学赵文静，因入学前由家庭包办成婚，与丈夫志趣不合，精神非常痛苦。她不甘受人摆布，又缺乏抗争的勇气，便和另一个相同命运的女学生离校出走，到太原城北门外的尼姑庵当了尼姑。刘亚雄等同学深深同情她们的遭遇，便跑到尼姑庵去看望，并劝她们回校读书，不要自暴自弃，毁掉自己的一生。赵文静回来了，可校方认为她们的举动玷污了学校的声誉，勒令二人立即退学，并把领头同情、支持她们的刘亚雄叫到校长办公室大加指责。刘亚雄毫不示弱，她说：“赵文静有什么错？她受包办婚姻的毒害，才不得已走这条路，我们应该同情她。你们不但不支持，反而要开除她，你有没有良心？”校长从没见过敢和他理论的女学生，气得火冒三丈。但他知道刘亚雄代表了大多数同学的意见，感到众怒难犯，不得不撤回开除赵文静等二人的成命，改为记过处分。这次斗争的胜利，使受封建礼教束缚的女学生们看到了光明，也使刘亚雄获得了更多同学的信任。

还有一次，当“五·四”爱国运动的春风，吹进太原女师校园，刘亚雄内心的爱国反封建思想很快与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融合在一起。她带领同学们办墙报、写文章，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并勇敢地向反动当局和校方提出抗议。刘亚雄以自己的切身体会，编写了一出活报剧在街头演出，用生动的形象，表现了妇女被缠足的痛苦，矛头直指封建礼教。许多人看了，都感动得泪流满面，产生了相当强的社会反响。于是，刘亚雄准备在校庆之日演出，然后深入农村宣传演出。可是，她们的演出计划却被校长粗暴地取缔了。刘亚雄等人草拟了致学校当局的公开信，勇

敢地站出来和校方谈判，要求学校允许同学们演出。学校和当局不能容忍新思想的传播和反封建烈火的蔓延，决定杀一儆百，宣布给刘亚雄记大过处分。布告贴出来，女师更是无人不晓刘亚雄的大名，无人不敬她的胆量。

不向封建礼教低头的刘亚雄，初涉世事便经受了挫折和打击，但她在挫折和斗争中认识了社会，开始了对社会问题的思考。

学生运动的组织者

1923年秋，刘亚雄以出众的才华考进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1924年改名为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预科，成为兴县第一个到北京读书的女大学生。她因此获得了山西省教育厅、兴县教育局的双份助学金。解除了经济困扰的刘亚雄，如饥似渴地学习，立志要为革新社会学到一些本领。鲁迅先生当时正在北师大教语文课。刘亚雄超群的文采和独特的写作风格，给鲁迅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4年，大革命的风暴席卷着北京的热土，也搅动着大学校园宁静的学习生活。学生们追求民主、进步，反对封建专制的要求日益强烈。正在这时，北洋军阀政府任命不学无术、专横跋扈、思想极其反动的杨荫榆担任女师大校长。她到女师大后，排挤进步教授，安插亲信，对学生进行封建家长式的统治，引起广大师生的强烈不满。11月，终于爆发了震动全国的女师大学潮。有着深刻反封建思想基础和丰富学运斗争经验的刘亚雄，站在了女师大学潮斗争的最前列，成为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她和赵世兰等同学串联学生，召开会议成立学生自治会，向校方提出抗议，并和同学们四处奔走，争取社会名流和社会舆论的支持。她们向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赵世炎汇报学运情况，听取党的指示，还多次出入鲁迅先生家，介绍学潮情况，倾听他的意见。

1925年暑期，女师大学潮的激浪和上海“五卅”惨案后全国声援运动汇合，进入高潮。8月1日，段祺瑞北洋军阀政府派出大批警察，荷枪实弹地开进校园，强迫在学校坚持斗争的学生即刻离校。黄昏时分，大雨如注，警察们蛮横地闯入寝室抛置行李，学生们奋力反抗，许多人被推倒在雨水中。此后接连几天，校内警察密布，断水、断电、断炊。为了使斗争继续坚持下去，刘亚雄以高超的组织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带领几个同学奔波于北京学联和兄弟院校求援并募集食品，然后乘夜深人静时，偷偷从墙外扔进校园，给受困的同学充饥。

8月2日，女师范大学在中央公园召开会议，全国各界妇女联合会等团体的代表、各通讯社、报馆记者150余人参加了会议。当时只有24岁的刘亚雄以精炼的语言和令人折服的口才，报告了女师大学潮的经过，公布了事实真相，赢得了与会者的同情和支持。北京学联、中共中央妇女部、全国各界妇女联合会，国立政法大学学生会等团体及各界人士，纷纷发表宣言、通电和文章，声援女师大同学的正义斗争。

北洋政府为平息学潮，下令强行解散了女师大。女师大的进步学生在鲁迅等进步人士的支持下，在宗帽胡同14号另辟校址，成立了由女师范大学自治会组织的新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鲁迅等30多位进步教授纷纷义务为新女师大同学讲课。李大钊同志也为同学们授课，对学生的行动给以有力支持。为了新女师大的生存，刘亚雄等人奔赴张家口，与爱国将领冯玉祥取得联系，得到了冯将军的支援，获得了办学经费。反动当局扼杀女师大的阴谋破产了，女师大学潮以进步学生斗争的胜利而告终。11月30日，刘亚雄和同学们兴奋地高举校旗，与鲁迅等进步教师一起，昂然地返回了原校址。从此，刘亚雄的名字和“女师大风潮”一起，作为大革命时期北方妇女运动的骄傲载入了中国妇女运动的史册。

刘亚雄在女师大学潮的斗争中进一步得到了锻炼，她在与共产党人赵世炎、李大钊等人的接触中，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于是，她正式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1926年2月，党组织吸收刘亚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刘亚雄从一个爱国、反封建的女学生成长为一名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先锋战士。

刘亚雄入党后不久，作为女师大的代表，参加了北京市学联的一次重要会议。为抗议帝国主义的“八国通谍”，维护我国主权和民族尊严，北京学联决定，在3月18日举行抗议集会。刘亚雄把学联的决议带回学校，并组织同学做了积极的准备。但18日那天，刘亚雄因劳累而病倒了，没有参加大会。女师大的学生队伍由学生会主席刘和珍带领，走上街头。当游行队伍来到段祺瑞执政府门前时，反动当局竟下令开枪镇压学生，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刘亚雄得知消息后，不顾病痛，带领留校同学赶往现场，营救受伤的同学。她组织同学们将满身伤痕、满脸血污的刘和珍、杨德群两位烈士抬回了学校，并和同学一起把她们的遗体擦洗干净，亲手给两位不屈的斗士穿上干净的衣服。然后，刘亚雄一边带领同学们向反动政府提出强烈抗议，一边积极筹备召开追悼会。几天后，女师大举行了有各界爱国人士参加的隆重的追悼大会，鲁迅先生亲笔写了挽联，并到会讲话。追悼会告慰了死者的英灵，唤醒了更多的爱国学生。悲痛、愤怒到极点的刘亚雄，更加坚定了斗争的信心。

刘亚雄在学生运动中的出色表现，使校方和反动当局十分恼火。“三·一八”惨案后不久，北京学联被查抄，北京教育部以学联代表名单中有刘亚雄的名字为由，宣布开除刘亚雄等4位同学的学籍。

1926年9月，党组织把年轻有为的刘亚雄等同志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刘亚雄告别了她学习和斗争过的女师大校园，又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能文能武的指导员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最猖獗的时刻，刘亚雄奉党中央的命令，于1928年从莫斯科返回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1年初，刘亚雄担任了河北省委秘书长，并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的战友陈原道同志结为伉俪。他们为革命工作各自奔忙，在一起生活的时间还不到几个月。然而不幸的是，1933年陈原道同志被捕，不久后壮烈牺牲在南京雨花台。陈原道和刘亚雄感情甚笃，他在被捕与牺牲前都没能与爱妻告别，甚至不知道刘亚雄已有孕在身。噩耗传来，一向坚强刚毅的刘亚雄悲痛欲绝。但她极力克制着自己，把对陈原道同志的思念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她发誓，要把陈原道同志的遗腹子抚养成人。她的儿子出世后，刘亚雄为他取名纪原，以纪念父亲，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纪原刚刚几个月，刘亚雄便把他留给父亲刘少白老人抚养，又投入到革命工作中。

1936年底，中共中央东北局组成以薄一波同志为书记的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利用阎锡山迫于形势，实行所谓“开明政治”的有利条件，赴晋开展工作。刘亚雄作为工委成员之一，参与领导了山西抗日救国牺牲同盟会和山西新军的工作，并担任了训练班女兵连指导员。

山西军政训练班女兵连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下的城市中第一支女兵连。全连190名爱国女青年，来自全国16个省市，她们脱掉学生装和旗袍，剪成短发，换上整齐的灰色军装，打着绑腿，组成了一支英姿飒爽的队伍。在太原国民师范的操场上，女兵们喊着口号，迈着整齐的步伐，在指导员刘亚雄的指挥下演练。刘亚雄身着黄色军装，腰佩武装带，显得威武、干练。她像一位训练有素的指挥官，细心观察每个学员的动作，不

时讲解一些要领，鼓励学员们的情绪。在课堂上，刘亚雄深入浅出地为学员讲解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国革命史、苏联十月革命和妇女解放的道理，教学员们唱抗日救亡歌曲。对于学员来说，女兵连是个温暖的集体，刘亚雄在生活上对她们体贴入微，使学员们在紧张的军事生活中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和欢乐的情绪。1937年旧历除夕晚上，刘亚雄耽心值夜班的同志想家，亲自端来了热气腾腾的丸子火锅，风趣地说：“吃了火锅不想家！”女兵连是一座革命的熔炉，刘亚雄和老一辈革命家培养起来的190多名女战士，像革命的火种，在抗日战争时期奔赴各个抗日战场，并随着革命队伍的发展洒遍全国，为人民、为祖国、为妇女的翻身解放而战斗。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37年8月，太原军政训练班改编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刘亚雄奉令准备去开辟太岳区抗日根据地。她在五台山及盂县待命的间隙，主动提出组织干部训练人民武装自卫队，发展抗日游击队。她在当地牺盟会的协助下，动员群众参军，很快组织起一百多人的队伍，成立了决死队领导下的第一支游击队，亲自担任游击队的政治指导员。部队在行军、作战、搞宣传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1938年5月，游击区队发展成三个，上级决定成立游击第一大队，刘亚雄被任命为游击大队的政治教导员。她与大队长密切合作，指挥大队在铁路沿线割电话线、挖地沟、翻铁轨，破坏敌人的铁路运输。同时，还在铁路沿线埋地雷、设埋伏，打击窜犯根据地的敌人。刘亚雄以身先士卒、不怕牺牲的精神，带出了一支勇敢的队伍。

游击队的干部、战士们都很钦佩刘亚雄，称赞她是不可多得的能文能武的指挥员。在抗日烽火连天的太行山上，刘亚雄成为闻名遐迩的优秀女军事干部。

1940年4月，党组织任命刘亚雄为太行区三专署专员。她是我们党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第一位女专员。刘亚雄在三专署工作了

近两年，她带领群众兴修水利，创办学校，开设贸易基地，成功地进行了反扫荡，使三专署出现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民情激昂的景象，表现了她高度的政策水平和卓越的理政能力。广大群众尊敬她、爱戴她，连敌占区前来参观的士绅们也为三专署的变化而惊讶、赞叹不已。

1942年8月，刘亚雄奉命离开了与她建立了深厚感情的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奔赴她日夜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

精明强干的市委书记

1945年8月，伟大的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刘亚雄结束了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学习生活，加入了开辟东北根据地的战斗行列。在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她先后担任了西满分局辽源市委书记、洮南县委书记等职务，领导和组织群众进行清匪反霸、土地改革、建党、建军、建政工作，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做出了贡献。1949年7月，刘亚雄被任命为中央直辖市长春市委书记，担起了建设新长春的重任。

当时的长春，虽已解放了九个多月，但它经历了日寇投降时的破坏和国民党盘踞三年的掠夺，仍然是满目疮痍，饥饿与贫困严重地威胁着市民的生命。在这座百业待举的废墟上开始城市的重建工作，刘亚雄感受到了党对她的信任，也更清楚自己的责任。她在和长春的干部见面的会上，充满自信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要紧紧依靠工人阶级，走发展生产、恢复城市经济的道路，努力建设好人民的新长春。

说干就干，刘亚雄立即组织干部对长春市进行系统的调查。她亲自到大工厂、商店、银行、公私合营和私营企业召开各阶层、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广泛征求各界人士的意见。经过3个多月的紧张工作，市委统一了思想，长春城市建设的规划草案制订出来了，

刘亚雄亲自主持市委进行讨论，并在长春市第一次党代会上通过。紧接着，她又组织召开了劳模大会、人民代表会议，使长春市城市建设规划成为全市共产党员、工人阶级和全体市民的共同奋斗目标。

在很短的时间里，长春发生了巨大变化。煤气、自来水、发电和交通运输等公共事业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供应问题逐步走上正轨。城市建设初具规模，清理了城市垃圾，疏通了上下水道，修补了重要街道和柏油路、方石路，这一切为安定人民生活和恢复发展工作生产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紧接着，刘亚雄抓住生产、建设这个中心，有计划地抓了机械工业、建材工业、加工业和轻工业的发展，调整了私营工商业的政策，支持和发展了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调动起各种经济成份的积极性。并在工厂中开展了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节省原料、提高质量、减少浪费为主要内容的创生产纪录运动，使长春的国民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1952年7月10日，刘亚雄同志在市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说：“三年来，长春的经济发展是迅速的。1951年国营生产总值比1949年增长14.7倍。”

刘亚雄非常重视城市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每个星期一上午，她都要请各大学的校长、书记、科研所长、东北电影制片厂的厂长、书记等人到市委来，同市委主要领导一道学习理论和中央的重要指示，并联系实际工作进行讨论、交换意见。刘亚雄常常说：“过去熟悉的东西今天用不上了，不重新学习是管不好城市的。”她注意学习管理知识并注意向有实践经验的干部、工人、知识分子学习，注重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也使自己的领导水平提到一个新高度。

刘亚雄这位为追求中国妇女解放不懈奋斗几十年的女市委书记，在领导长春建设的百忙之中，没有忘记关心和解决妇女问题的责任，把妇女工作提到重要日程。她多次过问长春市妇女联合

会组织的筹建工作，指示“首届妇女代表大会应成为动员团结全市妇女走出家门参加革命的建设的新起点。”1951年，市委首次发出了《关于加强妇女工作的指示》，提出把发动妇女投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为妇女工作的首要任务。为了使妇女身心健康地工作，刘亚雄多次指示市民政局、市妇联要努力发展托幼事业，解放更多的妇女劳动力。在她的高度重视和亲自过问下，在有关部门的积极努力下，长春建立了孤儿院。机关、烟厂、火柴厂等许多单位先后建立了托幼园所。广大妇女愉快地走上生产岗位，精神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刘亚雄的直接领导下，长春市还卓有成效地进行了改造妓女的工作。1951年“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这一天，长春市各界妇女两万多人在胜利公园隆重集会。刘亚雄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风尘仆仆地来到妇女群众中。她仍然穿着灰色干部制服棉袄，戴着蓝色的八角棉帽，令人可亲可敬。妇女群众看见她，不由得热烈地鼓起掌来。刘亚雄面带微笑、声音宏亮地问大家：“同志们，在面临抗美援朝艰巨任务的今天，我们应该怎样纪念‘三·八’节呀？”她的话音刚落，全场犹如隆隆滚过一阵春雷，群众的情绪顿时高涨起来。“组织起来，保卫和平！”“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声响彻会场。大会以后，长春市广大妇女积极投入到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中。

刘亚雄领导全市人民忠实地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积极完成了抗美援朝的后勤供应工作，完成了接待志愿军伤病员和安置朝鲜难民、孤儿的工作。她还强有力地领导了长春市的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运动。

刘亚雄为长春的建设和振兴呕心沥血，做出突出的贡献。1950年，毛泽东主席在周恩来总理陪同下来长春视察工作，1951年，宋庆龄副主席在林伯渠同志陪同下视察长春，看到长春的城市街道整洁，面貌焕然一新，工作井然有序，都给予了高度评价。宋庆龄副主席还十分兴奋地说：“精明强干的市委书记竟是位女同志！”